

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历史脉络、 理论梳理及未来展望

于法稳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摘要】：中国生态经济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许涤新先生倡导下的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学者的一次完美合作。此后成立了全球第一个研究生态经济的学术团体，创立了全球第一份研究生态经济的学术期刊，搭建了全球第一个专门从事生态经济研究的学术机构，推动了中国生态经济的研究及学科建设。可以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 40 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生态平衡理论阶段（1981—1983 年）、生态经济协调理论阶段（1984—1991 年）、可持续发展理论阶段（1992—2000 年）以及绿色发展理论阶段（2001 年至今）。同时，在对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发展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每个阶段的主要理论进行了阐述，并从五个方面展望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协调 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21)08-013-08

一般而言，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以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路径，以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可持续性相统一为原则，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1]。尽管早在 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就提出了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倡议，但却是中国最早创立了生态经济学^[2]。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许涤新先生就倡导创建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1984 年 2 月，在他的领导带动及亲自协调下，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紧密合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这比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成立（1989 年）早了 5 年，成为全球第一个专门从事生态经济研究的学术团体；1985 年，全球第一份专门研究生态经济的学术期刊《生态经济》创刊，比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会刊 Ecological Economics 的创办早了 4 年。此外，1987 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了生态经济研究室。这是中国最早专门从事生态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这都为开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提供了平台、阵地，推动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和生态经济学科建设。

自许涤新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生态经济学至今，中国生态经济研究走过了 40 年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

¹**作者简介：**于法稳，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资源管理、农村生态治理及农业可持续发展。E-mail:yufaw@cass.org.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研究”（17AZD012）；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点项目“中国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施状况调研”（GQZD2020015）；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A 类项目“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2018NFS01）

态经济理论。从最初的生态平衡论，到生态经济协调论，继而发展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新时代的绿色发展理论。在推动生态经济学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生态经济实践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1 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生态经济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1980 年 8 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先生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我国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同年 9 月，许涤新先生主持了我国首次生态经济问题座谈会，从此拉开了中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这也成为中国生态经济学创建和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纵观中国生态经济研究发展 40 年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1 以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理论研究阶段(1981—1983 年)

改革开放之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关注的重点是粮食生产，着重解决国人的温饱问题，忽视了大农业生产系统的生态平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1983 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实现农业发展目标，必须注意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生态经济学界围绕着上述三大问题开展了系列的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环境，为学术界更加注重实际、更加勇于讲实话、讲真话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一大批专家学者对当时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就小兴安岭林海^[3]、西双版纳森林^[4]以及长江水土流失^[5-6]等问题发出了预警呼吁，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该阶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生态经济研究以生态环境预警为基础，创建了以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紧紧围绕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这个主题。换句话说，就是明确了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做什么”，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平衡，这也是生态经济学最初的理论内核。1983 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生态经济学论文集——《论生态平衡》，成为这个时期生态经济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1.2 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理论研究阶段(1984—1991 年)

1984 年 2 月，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展开了研讨，并在“必须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一原则方面达成了一致。这一阶段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应该做什么”，生态经济研究的主题与主线就是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生态经济学初步形成的最典型的标志，就是《生态经济学》(许涤新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出版)一书的出版，该书的核心就是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1985 年，全球第一份专门研究生态经济的学术期刊《生态经济》在云南省昆明市创刊。此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生态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对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进行了总结，推动了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基于上述理论进行了创新研究，初步提出了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论。这时期出版了 150 多部专著，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主题不仅涵盖了基础理论以及人口发展、森林和草原等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而且还涵盖了农业、渔业、乡镇企业等产业的发展，并且涉及城市、区域的生态经济问题，为中国生态经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撑及决策参考。

1.3 以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理论研究阶段(1992—2000 年)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共同战略，在联合国 1992 年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共识，并通过《21 世纪议程》等文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倡议，于 1994 年率先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 年 3 月 25 日国务院第 16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该白皮书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1994 年 9 月，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山西省运城地区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主办，其中心议题是“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刘国光研究员认为，中国生态经济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领域，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一般的宣传工作向扎实做好普及培训工作转变，从理论概念的研究向参与实践工作转变，从生态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将生态、经济、社会统一起来研究，拓展研究面。

随着中国生态经济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实践内容的不断丰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研究也逐步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所拓展，并逐渐渗入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而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这一阶段，王松需主编的《走向 21 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和刘思华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典型的代表之作。相比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生态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深入，推动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实现了“应该做什么”向“应该如何做”的转变，为指导生态经济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1.4 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理论研究阶段(2001 年至今)

进入 21 世纪，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滕藤研究员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生态化与知识化的时代潮流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不能重走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之路，必须实现与生态化、知识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之路，并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贡献中国智慧。为此，需要围绕着工业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进行相关研究^[7]。

2003 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大战略思想的一次升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了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重大战略思想的又一次升华。新发展理念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层面和实践领域的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8]这些顶层设计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目标、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经济实践也出现了新特点、新需求，为中国生态经济研究提出了时代新课题，推动了生态经济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洋生态经济研究成为生态经济学界的一个崭新领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出版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期间，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相继成立了生态恢复专业委员会、工业生态经济与技术专业委员会、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以及海洋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程国栋院士、金涌院士、费维扬院士及丁德文院士分别担任上述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一阶段，将“应该如何做”提升到“应该如何高质量做”。刘思华主编的《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丛书》、李周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点教材《生态经济学》、沈满洪主编的《海洋生态经济学》是典型的代表之作。

2 生态平衡理论的主要内容

前面已经提到，生态平衡理论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只有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保持生态平衡的相对稳定，进而实现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之间的统一，并且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主动^[9]。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生态系统平衡也是一个目标，但生态平衡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或者约束条件。

2.1 生态平衡的内涵特征

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系统内生物与生物、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属于生态系统的一个特性。某一地区的生态平衡是由该地区特殊的生物和环境条件决定的，生物与环境所构成的网络体是生态平衡形成的基础^[10]。从生态学意义上来看，在每个生态系统中，都具有由一定生物群体和生物栖居的环境所组成的结构，它们之间进行着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信息传递。简言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状态，即生态平衡。

自然生态系统需要保持生态平衡，人工生态系统也需要保持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及必要性特点，而生态失衡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具有暂时性及过渡性特点。如果发展是以平衡为基础，就形成了“平衡—不平衡—平衡”之规律^[11]。对农业生态系统平衡来说，它具有典型的矛盾统一体特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它总是循着“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新的不平衡”的规律，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循环往复^[12]。

2.2 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生态平衡不仅在生态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再生产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马世骏先生就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概念，他认为，该系统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形态，由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对该系统而言，从整体、长远来看，生态平衡是经济平衡的一个物质基础，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实践证明，如果生态平衡规律遭到破坏，必然影响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影响到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影响到社会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从整个部门来说)，进而影响其供需关系^[13]。生态经济学强调生态平衡，但并不是在搞自然主义，让自然环境保持原始状态，而是要求人们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把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物质前提来看待。若生态平衡遭受破坏，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也就很难顺利进行^[9]。

2.3 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分析

总体来讲，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可以概括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从生态经济学视角来看，人为因素往往是生态平衡失调的主要原因。人为因素引发环境因素的改变，再加上与自然因素的叠加，就会导致生态平衡失调或破坏。

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物质文明建设是首要任务，由此导致目标瞄准的单一性，实现目标的政策势必偏颇，成为影响生态平衡的主要人为因素。如，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粮为纲”政策的实施，引发了许多地区毁林开荒、毁草开垦、围湖造田^[14]，打破了区域生态平衡，进而破坏了区域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农业内部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2.4 实现生态平衡路径的探讨

生态经济理论主张把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结合起来研究和运用，并认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生态规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以符合生态规律为前提^[15]。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尊重生态经济规律，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及成效，相反有利于其健步前进。遵守生态规律可以有效地克服水土流失、环境污染，进而实现系统的生态平衡^[16]。

生态经济学要求人民算大账、算总账，衡量整个系统的得失。对于任何一个足以影响区域性自然功能的建设项目和改造局部自然生态环境的措施，必须同时运用整体观和经济观，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生态效益，并符合下述原则：一是有益于局部，也有益于全局，至少无损于其他；二是有利于当前，照顾到今后，至少无损于未来；三是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无损于人体健康^[10]。

针对采取什么路径实现生态平衡，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保护和开发、利用和改造、点和面、农林牧副渔业之间的关系，根据生态规律合理利用自然，采取生物措施来改造自然。单纯利用工程措施来改造自然，其结果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态平衡^[17]。

3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强调生态平衡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哪些是不能做的”，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需要探索“应该怎么做”的发展之路，即应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围绕着“应该怎么做”，生态经济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推动了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新。

3.1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性

“中国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如何、何时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每个中国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选择，要求人们认真地考虑更深远和更广泛的长期问题。特别是，新的消费需求直接涉及长期发展方式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对中国长期发展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更彻底的探讨^[18]。

未来发展方式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针对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率的问题，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性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过去长时期的经验证明，以追求数量为主要目的，以增加投入为主要手段的外延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必然反复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调整的剧烈波动，造成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损失。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层次的升级，如不改变过去浪费资源型的粗放发展方式为节约资源型的发展方式，中国的资源根本承受不了！我们应当强调人均水平和发展质量上的差距，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一方面来，特别是把我们自己的努力放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人均水平上来，而不必在总量增长上大做文章，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符合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要求。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个局部性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所以要从事各方面来采取有效的方针措施，把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要求贯穿体现到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今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19]。

3.2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特征剖析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过程，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劳动交换的经济过程。对生态经济系统而言，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形态，就是由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关系、生态经济平衡、生态经济结构、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目标、生态经济规律等^[20]。

3.3 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的重要内容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生态经济理论，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生态经济实践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指明了生态时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因此，可以说生态经济协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解决，推动了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立，也成为中国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21]。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解决了生态平衡论中“不能做什么”的问题，提出了“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与此同时，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还解决了目标定位问题，生态与经济都成为发展目标。但只是提出了必须实现生态与经济要协调发展，但没有给出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

4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既是追求的一个目标，又是实现现代化战略总目标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双重意义。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强化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而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二者密不可分。只有同时强化二者的要求，才能有效地保证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22]。可持续发展理论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即走什么发展道路的问题。

4.1 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传统发展观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完全忽视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性，更没有系统考虑到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而后者恰恰是现代社会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这种发展观严重违背了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是经济不断增加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的基础这一铁的法则，已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由此诱导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

4.2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特征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建立，不仅表明人们认识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经济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表明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23]，进而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生态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可持续发展理论表明，可持续发展经济具有如下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可持续发展以生态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为主导、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二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最佳模式是物质、人力、生态三种资本共同增殖。三是可持续发展经济需要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24]。

4.3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拓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现了相应的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逐渐渗透融入消费领域。以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转变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方式的绿色化。引导可持续消费模式建立应是政府的责任，而改变政策严重缺位的状况是其重要一环。当务之急，政府需要大力营造可持续消费的舆论环境，以多种途径加以教育和宣传，树立科学的消费观。从中长期来看，构建起我国完整的可持续消费政策体系离不开规范和明确的消费规则，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法律体系^[25]。

5 基于“两山”理念的绿色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提出，并加以系统化，绿色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全会提出的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呈现的不仅是发展理念的新定位、新高度，更是务实可行的发展手段与工具。相对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发展理论的逻辑性、系统性更强，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绿色发展理论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解决了“发展质量”问题，使得发展路径更加科学、发展模式更加科学。

5.1 绿色发展理论及其特征

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演变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成功地把被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释放出来，同时对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目前深化改革的重点则拓展到把被经济系统冲击的生态系统保育好，为实现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这正是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的背景。

绿色发展因其直观而被广泛接纳，但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它是一种设计理念和方法，并且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宗旨；其次它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强调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最后它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以及生态环境的容量。基于此，绿色发展的内涵可以概括如下：在目标层面，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要素层面，资源环境作为发展的内在要素；在路径层面，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转型。

5.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从本质上来讲，绿色发展实现了协调对象的拓展，即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更是对实现绿色发展路径的最好阐释。从绿色发展关注重点的演变来看，从最初关注自然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逐渐拓展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绿色发展作为一种高质量发展之路，逐渐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历程的不同时间节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先后经历了污染的警醒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失控的生态代价、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制衡与对抗、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推进与制度保障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环境政策和制度演进以及生态环境状况的驱动因素不同，其形势、政策和制度建设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党的十九大之后，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认知更加深入，实践也进入一种新境界，助力了环境负债的逐步消除，也促进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升，实现了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推动了美丽中国建设，对全球生态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6]。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目标指向所在。改革开放不是凭空产生的，绿色发展更是历史延续的产物和需要。改革开放前，人与自然的冲突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为满足基本粮食需要而破坏自然引发的生态失衡^[27]。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水、良好的环境，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公平的^[2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将社会经济活动限定在资源承载能力及环境容量范围之内，这样才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之间的统一^[29]。

5.3 绿色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及工具

(1) 生态资产及生态资本。

生态资产是从物质形态方面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生态系统和化石能源；从价值形态方面而言，生态资产则表现为自然资源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生态产品价值。生态资产并不等于生态资本，成为生态资本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生态资产的所有者对其进行自由有偿转让，并能获得相应的收入^[30]。

(2) 生态安全与生态红线。

严格意义上来讲，生态安全有三层含义，一是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优良，可以实现自身发展和能力的提升；二是生态环境条件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有效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健康免受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害。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区域与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定的生态环境基础和支撑^[31]。

生态保护红线是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生态红线保护区主要保护三大功能：一是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支撑；二是保护生态敏感区、脆弱区，减缓与控制生态灾害，构建人居环境生态屏障；三是保护关键物种与生态系统，维持生物多样性，促进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划定的具有精确边界的生态保护红线区，是维系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核心生态区域^[32]。

(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直以来都把自然界作为无尽的资源利用，而没有考虑到自然界承载能力的有限性。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系统资产及生态服务价值等属性的认识，也只是近 20 多年的事情。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缓解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迫切需要对生态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为生态系统资产化管理、生态补偿、生态服务有偿使用等政策实施提供支撑。中国作为人均生态资产非常稀缺的国家，对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的迫切性更加强烈^[33]。

为了保护自然资产，提高生态服务供给能力和合理消费生态服务，需要了解生态资源到底有多少价值。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化非常困难，到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公认的标准方法，但学术界对量化方法进行了大量探索，如，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条件价值法、旅行费用法等。目前，无论是全球尺度上，还是国家尺度上，抑或是区域尺度上，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的值都非常高。尽管如此，依然还有可能对生态系统一些服务价值没有进行计量。由此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能够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存在比我们想象到的要更加重要，二是可以反映出生态系统实际提供的价值有多少在市场上实现了，有多少没有实现^[34]。

人类在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自身发展进程中，如果利用方式不当，势必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造成强烈的影响。除部分人类活动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稳定与提高外，更多地则导致了一系列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危机与灾难^[35]。

(4) 生态补偿机制。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针对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的日益突出，自然科学界在进行技术研究的同时，社会科学界也进行了制度性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就是其中之一。生态补偿是预防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资源节约、加强生态的恢复与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36]。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其核心问题包括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生态补偿的实施应以产权的明晰为基础，补偿额度须以资源产权让渡的机会成本为标准，进而设计生态补偿机制^[37]。

中国在建立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中，应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条件、生态保护问题、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社会制度核心等方面的特殊性，重点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友好型的税费制度、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制度、流域生态补偿机制^[38]。对狭义的森林生态补偿而言，实施“三步走”战略：一是补偿基金完善阶段，二是补偿基金与生态税双轨并行阶段，三是生态税独立运行阶段^[39]。

(5)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可以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既包括有形的生态系统产品价值，也包括无形的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可以用于揭示生态系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贡献，分析区域之间的生态关联，评估生态保护成效和效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可以反映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并为建立生态系统保护效益与成效的考核机制提供基础^[40]。

6 生态经济研究未来展望

总结历史，在中国生态经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不断提升、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中国生态经济实践进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望未来，在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生态经济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时代课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时代赋予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更大的责任，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6.1 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中国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认识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突出表现为深邃历史观、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基本民生观、整体系统观、严密法治观、全民行动观、共赢全球观。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的战略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生态经济学界应将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首要任务，以深入研究新时代新发展阶段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发展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传播中国生态经济思想。

6.2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生态经济学具备了较好的理论体系，但在研究方法方面，仍缺乏创新性。特别是，在新发展阶段时代赋予了中国生态经济研究的历史课题，迫切需要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这是由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状况、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以及传统文化决定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动中国生态经济创新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奠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41]。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生态经济学界的历史重任，需要生态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实践，开展深入研究，提出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原创性的方法，更好地体现出中国国情与中国智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生态经济学^[41]。在为中国生态经济实践服务的同时，为解决全球生态经济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6.3 加强高质量发展理论与模式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由注重“快”转向注重“质”，这是对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弊端进行的反思，更是对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42]。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质量，满足人民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以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因此，高质量发展作为新发展阶段的主题，既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也是必然选择。

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有效地降低生态、资源和环境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系统的健康水平。要达到这些目的，不仅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而且有更多发展模式问题需要探讨，这些都是中国生态经济学界在新发展阶段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6.4 注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绿水青山是一种优质资源，可以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其本身质量再好，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山银山，只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基础。实现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需要一个有效的桥梁。绿水青山是一种潜力，是一种竞争力，也是一种可持续力。因此，迫切需要探索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由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是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时代任务和重大实践课题，更是中国生态经济学界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

优质生态产品属于供给短缺的稀缺产品，要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首先要确定生态产品价值的内涵及其价值核算，也就是生态价值核算。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还存在着价值转化认识不统一、价值核算不规范、价值实现渠道不顺畅、价值

转化不充分等四个问题^[43]。

6.5 开展新发展格局下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在此背景下，中国生态经济学界应紧紧围绕着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及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模式探索，特别是针对形成绿色新发展格局有效路径开展研究，提出相应的观点。此外，中国生态经济研究需要将绿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与路径作为重要内容，而且切实要把相关战略研究放在突出地位！

参考文献：

[1]魏后凯. 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研究 70 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沈满洪. 生态经济学[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3]何迺维. 小兴安岭林海的危机及其前瞻——伊春林区林业经济结构调查[J]. 农业经济丛刊，1980(3)：38-44.

[4]何迺维. 西双版纳的森林资源亟待拯救[J]. 农业经济问题，1980(11)：10-13.

[5]何迺维. 长江有成为“第二黄河”的危险吗?[N]. 光明日报，1979-07-31.

[6]何迺维. 长江的输沙量是没有增加吗?——再谈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危险[J]. 农业经济问题，1980(12)：49-52.

[7]滕藤. 21 世纪是我国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的世纪[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1(1)：1-2.

[8]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许涤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J]. 学习与思考，1983(4)：1-5.

[10]马世骏. 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N]. 光明日报，1982-02-05.

[11]侯学煜. 农业生产与生态平衡[J]. 农业经济问题，1981(4)：34-40.

[12]叶谦吉. 生态农业[J]. 农业经济问题，1982(11)：3-10.

[13]许涤新. 实现四化与生态经济学[J]. 经济研究，1980(11)：14-18.

[14]许涤新. 生态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J]. 生态经济，1987(1)：2-8.

-
- [15]石山.我国生态经济的现状和存在问题[J].水土保持通报,1985(5):42-48.
- [16]许涤新.社会生产与人类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问题[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1-9.
- [17]侯学煜.从生态系统观点谈发展我国农林牧副渔业的几个关系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1980(2):21-27.
- [18]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M].香港:大风出版社,2012.
- [19]刘国光.略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J].管理世界,1996(1):3-6.
- [20]刘思华.关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的几个问题[J].生态经济,1987(6):1-3.
- [21]王松霏.中国生态经济学创建发展3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22]李成勋.李成勋学案续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 [23]李周.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进展(续)[J].林业经济,2008(10):6-11.
- [24]刘思华.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1997(3):46-54.
- [25]郑玉歆.政府引导可持续消费模式的责任与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5(1):5-11.
- [26]潘家华,庄贵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知迭代与实践进程[J].闽江学刊,2018(6):5-13,133.
- [27]潘家华.从生态失衡迈向生态文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与展望[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8(4):3-16.
- [28]潘家华.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J].当代党员,2018(1):24.
- [29]潘家华.与承载力相适应确保生态安全[J].中国社会科学,2013(5):12-15.
- [30]高吉喜.生态资产评估在环评中的应用前景及建议[J].环境影响评价,2014(1):26-29.
- [31]欧阳志云,崔书红,郑华.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科学与社会,2015(1):20-30.
- [32]高吉喜.探索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监管[J].生物多样性,2015(6):705-707.
- [33]谢高地,张彩霞,张昌顺,等.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J].资源科学,2015(9):1740-1746.
- [34]谢高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实现机制[J].环境保护,2012(17):16-18.
- [35]郑华,欧阳志云,赵同谦,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J].自然资源学报,2003(1):118-126.
- [36]靳乐山,魏同洋.生态补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J].探索,2013(3):137-141.

-
- [37]毛显强, 钟瑜, 张胜. 生态补偿的理论探讨[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4): 38-41.
- [38]王金南, 万军, 张惠远. 关于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的几点认识[J]. 环境保护, 2006(10): 24-28.
- [39]李文华, 李世东, 李芬, 等. 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若干重点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2): 13-18.
- [40]欧阳志云, 朱春全, 杨广斌, 等.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概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J]. 生态学报, 2013(21): 6747-6761.
- [41]曾贤刚. 构建新时代生态经济学建设新时代生态经济体系[N]. 中国环境报, 2020-08-07.
- [42]秦放鸣, 唐娟. 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138-143.
- [43]王金南. 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是时代重任[N]. 浙江日报, 2020-08-17.